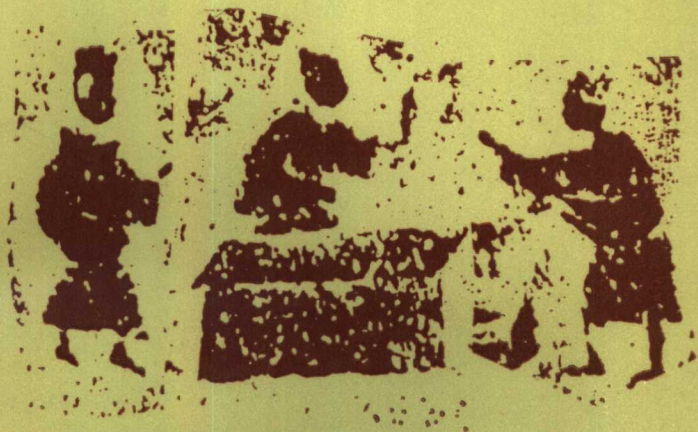




史记名篇赏析

朱靖华 顾建华 等



史记名篇赏析

朱靖华 顾建华 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史记名篇赏析》，从《史记》中精选了20篇人物传记，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长期以来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名篇。

本书对入选名篇的难字、难词、生僻典故等进行了注释，并对其思想、艺术特点，特别是传记作品的立意取材、形象塑造、描写手法、语言运用等方面，结合作者多年实际的教学经验，进行了透辟而有新意的鉴赏和分析，适合大中学校师生、自学青年、文学和史学爱好者阅读。

史 记 名 篇 赏 析

shi ji ming pian shang xi

朱靖华 顿建华 等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德外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22,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10

ISBN 7-5302-0164-6/I·162

定 价： 6.25 元

前 言

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不但是部体大思精、无与伦比的历史名著，而且也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影响巨大而深远。

伟大的著作是伟大的时代的产物。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最为兴旺的大帝国。整个社会充满生气勃勃的雄放精神，迫切需要总结几千年特别是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呼唤着体现时代精神的巨著，也为这样的巨著的诞生创造了历史条件。

但是，伟大的著作还要由伟大的人物来完成。司马迁独特的出身经历和杰出的才华使他成为这部巨著的当然执笔者。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前135年），卒年大约在前90年左右。他出身于世代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是个大学问家，给他以良好的教育。少年时司马迁曾从今文学大师董仲舒和古文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二十岁后去各地游历，足迹遍天下，使他得以考察历史发展的遗闻旧事，了解民间疾苦，文章也因江山之助，跌宕而有奇气。在他三十五岁时，父亲病逝。他接受了父亲的遗

训，立志作一部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通史，歌颂汉家一统的威德。三年后继父任职太史令，得以博览石室金匱所藏文献，为写史作了资料准备。在改定历法的工作完成后，于四十二岁时开始全力写作《史记》。

然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六年之后因替兵败被俘而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以为是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讽刺朝廷用人唯亲，为败降的李陵游说，于是被捕下狱。次年以“诬上”罪处以“腐刑”。这使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大伤害，本来打算“引决自裁”，但为了父亲的遗训，完成“草创未就”的《史记》而“隐忍苟活”，发愤著书。司马迁从自身惨痛的经历中清醒地认识到了汉家天子的刻薄寡恩，以及官府、“王法”的残忍黑暗，从而在《史记》中大大加强了对世态炎凉的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抨击，抒发他的“愤懑”不平之气。大约经过五、六年，司马迁五十三四岁时，终于完成了《史记》。其后不久就去世了。

《史记》之所以能成为亘古未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之所以能如此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历史的某些本质，之所以激荡着那么强烈的感情，这当然是时代提供了条件，但不能不说同司马迁家学渊源、师承名流、博览群书、足迹遍天下，特别是横遭李陵之祸的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遭遇紧密相关。因此，我们说：是时代造就了司马迁，是司马迁完成了时代的使命！

《史记》纪事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计约三千年的历史。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一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纪传

体通史。《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编纂历史的方法主要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把有关历史事件分别记载到人物传记中，以此反映历史的进程、演变；由于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时，作了出色的艺术描写，因而《史记》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些优秀的传记作品犹如人物画的长廊，以其各具神态、栩栩如生的形象，使读者产生爱、憎、喜、怒，从他们演出的壮阔的活剧中去了解人生，悟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深刻的哲理。其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都是前无古人、光映万代的。

《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他突破一般封建地主史学家只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局限性。在《史记》的人物画廊中，不只有帝王将相，还有学者策士、刺客游侠、草泽英雄、医巫隐士、商贾土豪、民间百姓，构成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画面，从而证明了社会各阶层人物都对历史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观点，也反证了历史循环论的不科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真诚地实录史事，且“是非颇谬于圣人”，敢于超越传统见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历史人物臧否褒贬，使传记作品的思想性达到了他那个时代、那个阶级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史记》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在历史上是否推动过社会的进步为着眼点来评价人物。例如把曾经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争夺天下而以失败告终的项羽列入主要记载帝王业绩的“本纪”，由于他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建立了“近古以来未尝有”的功勋而给以满腔热情的歌颂。陈涉出身雇农，但因他振臂一呼，首事反秦，虽然起义六月即兵败身亡，《史记》却把

他写进主要记载诸侯业绩的“世家”，认为陈涉发难同汤武伐桀纣、孔子作《春秋》是同样的勋业。后世囿于迂腐陈见的史学家，对此不能理解，责为“乖谬”，这恰恰从反面说明司马迁思想的先进性。

《史记》对不避艰险、忠心为国的贤臣名将、志士仁人也作了倾心赞扬。其中有贵族，如礼贤下士、一身而系魏国安危的信陵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虽遭放逐，仍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的屈原；有将相，如齐国的不惧权贵、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司马穰苴和与士卒同甘共苦、用大摆火牛阵一举复兴祖国的田单，赵国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和被陷害逃往他国却至死“思用赵人”的廉颇；还有平民，如在国家即将覆灭的关头，挺身而出为平原君献策，并率三千敢死之士壮烈捐躯的李同，等等。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些人物的爱国是和忠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千百年来，司马迁所赞扬的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申张正义、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一直给人以巨大的鼓舞作用，对我们民族的兴旺、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史记》更为人注目的是，不仅在许多传记中颂扬了出身卑微的平民百姓，而且还专给这些后世官史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下层人物作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写的聂政、荆轲、朱家、郭解、淳于髡、优孟等人，大抵是市井细民，有的还是被当时人看不起的赘婿、倡优。但他们见义勇为、急人之难，或扶助弱小，铲除强暴，或对人主的暴戾凶残、胡作非为给以机警的讽喻，敢批逆鳞、论大事。《史记》这种对下层人物的描写和赞美，是与正统思想家、史学家的观点相悖的，因而有人指责为“退处士而进奸雄”，是

《史记》之“所蔽”。实际上，这正显示出司马迁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和人民思想感情的息息相通。

《史记》还对于受到统治者迫害的人物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大书他们的功绩。韩信被诬谋反而遭族灭，但《淮阴侯列传》却详尽地写出了他在楚汉之争中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卓越勋业。李广屡遭磨难，最终被逼自刭，但《李将军列传》却尽情讴歌他的过人胆略、超群武艺和带兵才干，讴歌他在抗击匈奴中的屡建奇功。对于遭到封建专制主义残酷迫害的人物，司马迁总是要一掬同情之泪，表现出他和统治者们的不同评价。

一部《史记》，不仅有赞歌，有颂词；更有揭露，有抨击。司马迁的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不为权势人物乃至最高统治者涂脂抹粉，而敢于秉笔直书封建统治集团的黑暗内幕，还它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使是当朝的开国皇帝及其子孙们，包括还在位的“今上”，都有勇气掀夺去他们自己及御用文人涂抹上去的“神圣”的光圈。

汉高祖颇有些神异的故事，例如他的出生，便非同一般，雷电晦冥，蛟龙附身，“遂产高祖”，俨然是个“真龙天子”。司马迁虽然也记下了这类奇谈，但是我们细读《高祖本纪》、《项羽本纪》以及写到刘邦形象的其他传记，就不难发现他的种种劣迹，他的投机取巧、因人成事而又极端自私、阴忍的流氓性格。司马迁写他彭城逃命几次丢儿弃女，登基称帝当众挖苦父亲，与人有约却又变卦害人，过河拆桥蓄意滥杀功臣……字里行间流露出极大的讽刺和憎恶。

对这位开国之君的皇后吕雉，司马迁尖锐地揭露她的毒

辣、专断；她的戕害刘邦宠妃戚夫人、惨杀刘氏宗室的残酷手段，令人发指。

对当时在位的汉武帝也没有笔下留情。可惜《今上本纪》由于锋芒毕露而被削除。但从《平准书》、《封禅书》以及他人的传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好大喜功、愚蠢昏悖、滥施酷刑、残害人民的形象。例如《游侠列传》就写到关中贤豪交相赞誉的郭解，就是在汉武帝的亲自过问下被满门抄斩的。《酷吏列传》甚至明明白白地写出酷吏杀人正是为了迎合皇帝的旨意，“所治即上意所欲罪”。对滥杀无辜的酷吏们，“天子闻之，以为能”。这些都是对汉武帝的揭露。

至于贵族集团、官僚社会的丑事秽行、倾轧争斗、草菅人命、腐败堕落，司马迁更是淋漓尽致地予以揭露。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是何等地残忍，令人瞠目结舌。

象《史记》这样大胆、深刻地揭露、批判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封建统治集团，在历代史书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遭到统治集团的攻击。汉章帝骂他“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汉献帝时王允斥《史记》为“谤书”（《后汉书·蔡邕传》）。连篡汉得天下的魏明帝居然也叫喊：“令人切齿。”（《三国志·王肃传》）可以想见《史记》的揭露和批判，是如何地引起震动。

但是正直的、进步的史学家、思想家对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为尊者讳”的做法却备加称颂。如裴松之就辩驳说：“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斯世，……但迁不为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在我们今天看来，司马迁的这种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正表明他能突破封建阶级正

统思想的束缚，能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观察、分析社会，总结历史，表现了超越一般史学家的远见卓识，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进步的思想境界。

《史记》是熔铸着司马迁强烈感情的叙事诗篇。虽然在他的歌颂和贬斥中，不无偏颇之处，例如由于自身曾深受酷吏峻法之苦，而对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些改革家商鞅、吴起、晁错等的评价有失公允；揭露汉武帝多欲寡思、昏庸愚昧较多，而展示其雄才大略、兴汉功绩则不足。然而，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却能不听任感情左右，随意杜撰或抹煞历史人物的功过。他所追求的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写出历史人物本来的样子，而不搞脸谱化、绝对化。司马迁十分敬重项羽，但他又如实地写出并批评项羽的骄纵自大、轻信少谋、凶残暴虐、失尽民心的弱点和错误；司马迁厌恶刘邦，但他又详尽地叙述并肯定了刘邦的顺应时代、知人善任、机敏善变、恩威并施的优点和长处；司马迁仰慕魏公子信陵君、飞将军李广一流人物，但也不掩饰他们的过错；司马迁尽管不满商鞅、吴起、晁错等人，但却记载了他们治理国家的功绩；即使对他最为痛恨的酷吏，在痛斥他们戕害无辜的恶行的同时，他仍能写出其中一些人“廉平”、“扬人之善、蔽人之过”等令人尊敬的品质。人称《史记》“美恶具见，故为实录。”（《史记评林》引董份语）若没有高度的思想修养和正确的观点、方法，是决然做不到这一点的。

以上我们仅就《史记》传记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叙述和描写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成就作一概略的介绍。整部《史记》，无论是天道观、政治观、历史观、经济观、文学观、审美观……

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就不是一篇短短的“前言”所能说明的了。

《史记》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地位，不仅由于它的思想成就彪炳千秋，更由于它的艺术成就出类拔萃，同样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

《史记》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传记作品的立意和选材上。当时历史和文学还没有严格的区分。《史记》的很多的优秀的传记作品文学性极浓。虽然与后世的小说还有区别，其人物、事件不是虚构的；但也不同于一般的史书，即除了客观地记述人物的生平、政绩或其他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外，还表达了作者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抒发了自己的审美理想。明人茅坤说：“太史公极苦心处，都是描写自家一片胸臆。”近人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他的一些传记，与其说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写的，还不如说是以艺术家的情感来写的。他写的每一篇传记都有一个主旨，这个主旨可能无关乎传主在历史上的主要事迹、主要影响，但却能突出地反映司马迁的某一种理想、观念和情感。司马迁据此选择材料、组织材料，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重在歌颂蔺相如大智大勇、先公后私的品格，便截取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言和三个片断来刻画，而对蔺相如协助赵王、总理政务的才干和事迹却略而不提。《田单列传》也不写田单为相的重大事件，只在破燕复齐的壮举中选取与“奇谋”有关的一些事来写。象《管晏列传》更是只写了管仲、晏婴这两位大政治家与政治关系不大的几件奇闻逸事，来表达他对“结友推贤”的看法。

司马迁为了使每篇传记都有一个主旨，而又不致使真实

的历史人物只得到片面的表现，便创造了“互见法”，即苏洵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把与该传主旨不合或无关的史实不写在人物的本传中，而归入他人的传记中反映。例如《项羽本纪》主要是歌颂项羽拔山盖世的英雄气概，便写了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三个场景，表现他叱咤风云而又悲壮慷慨的形象。至于他为人凶残等等缺点、短处只一笔带过，未加渲染，而在《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中一一补叙。这样，既使《项羽本纪》能集中表达主题，又使读者对项羽有个全面的认识。象这样的例子，《史记》里是很多的。

司马迁有些传记的选材，用现代历史科学的观点来看或许不足取，例如由于“爱奇”，喜欢写些从民间搜集来的逸闻奇事。《李斯列传》写赵高指鹿为马，《魏其武安侯列传》写武安侯死时冤鬼索命，《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射石没镞等等，便是如此。从艺术的审美的观点看，选用这些材料大大加浓了文学色彩，更能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曾国藩说：“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十之六七。”（《求阙斋读书录》）明白这一点，就会懂得《史记》的立意和选材是高度统一的。

《史记》的艺术成就更为集中地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之前的史传文学，如《左传》、《战国策》也不乏精采的人物描写，但由于受到编年史或国别史的体例的限制，人物描写很难超越时间或空间，大都是一些历史生活的片断，不易见到全貌。而《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第一次把写人作为全书的中心，对人物可以跨越时空、多方位多侧面多层次地来揭示其思想性格。高尔基称文学为“人学”。我们说《史

记》不但是部历史著作，也是部文学著作，就因为它实际上也是“人学”。它的很多传记作品由于运用了同一般史学家概括叙述的方法不同的艺术描写手法，而使这些历史人物生动、丰满，形神毕现。

《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几乎囊括了现代小说的一切手段，因此被人称为我国小说的始祖。以下择其要者，略举几端：

背景描写。《史记》很重视“大处着眼”，把人物放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表现，由于勾勒了人物活动的背景，因而更能清晰地反映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历史地位。这较之先秦史书单纯以人物活动、事迹为记述重点的方法，更前进了一步。如《屈原贾生列传》大段铺叙屈原当时楚秦争斗的激烈图景，由此显示屈原内政外交路线的正确性和他的强烈的爱国品格。《魏公子列传》一开始就揭示“秦兵围大梁”的严峻形势，使人读下文会由衷赞叹信陵君仁而下士、广招门客使诸侯不敢加兵谋魏的功绩。

行动描写。《史记》总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塑造人物，这也超越了先秦史书写人时主观概念较明显的偏向，从而形成我国古典小说描写人物的最显著的艺术传统。《项羽本纪》“鸿门宴”一段写樊哙听张良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后，“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扑地，哙遂入，披帷西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一连串描写，似乎一个接一个没有话语的电影镜头出现在我们面前。通过樊哙侧盾闯帐、怒目而视的行动描写，把他的勇武、憨猛全都刻画出来了。

对话描写。用对话表现人物也是中国小说的特点之

一。《史记》的对话语言高度个性化，很能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出身贵族世家的项羽说起话来就和当过亭长、诞慢不羁、惯会骂人的刘邦就大不一样。《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的厚道平庸、田蚡的跋扈狡诈、灌夫的豪爽率直以及韩安国的圆滑、王太后的专横、汉武帝的恼怒等等都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的。

心理描写。《史记》还极善刻画人物的心理。如写叔孙通这个历事十主、阿谀求荣的人物，司马迁抓住他变换服装的典型行动，表现他隐蔽的内心活动：“叔孙通降汉王。……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这种无声的语言尖刻地揭露了叔孙通的卑鄙心迹，表现了他希世求荣的性格。再如《李斯列传》“行文以五叹为筋节”（李景星：《四史评议》），叙事中用李斯五大段独白来敞开传主的心灵的窗户，揭示其贪恋富贵爵位的精神境界。这样的心理描写要比《左传》、《国策》更胜一筹了。

细节描写。法国美学家狄德罗说：“……细节的真实使心灵容易接受伟大事故的强烈印象。”《吕太后本纪》写孝惠帝死，特意点出“太后哭，泣不下”，直至大臣如她之意让诸吕为将、入宫，“其哭乃哀”的细节，这就把吕后欲营私结党、培植吕氏集团，以独自专权的全部思想活动揭示出来，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史记》还不只重视重大事件中的细节描写，并且善于通过细小情事的精心刻画来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早年不得志时受恶少年胯下之辱的情景：“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从韩信不因无端受辱而意气用事这一生活细节中极好地表现了他的胸怀和度量。

场面描写。《史记》除了对人物本身的行动、言语、心理、细节等等的描写，还注重对人物活动场面的描写，借以造成一种表现人物彼时彼地的情绪、思想的氛围，极有感染力量。如《项羽本纪》的霸王别姬，《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渑池之会，《刺客列传》的易水送别等等都是通过场面描写，渲染气氛，而使人物的言语、行动更加动人心魄的。

《史记》还特别善于用对比、映衬的手法来写人。如《李将军列传》写李广，以程不识治军的严苛烦扰同他的简易宽厚对比，以李蔡的平庸无能而封侯拜相同他的屡建奇功却不得封侯对比，以统治者对他的步步迫害同士卒、人民对他的拥护、悼念对比，还以公孙昆邪对他的怜惜和匈奴对他的畏惧来映衬他的智勇双绝。从这些对比、映衬中李广的英雄业绩和不幸遭遇就表现得更鲜明。《史记》不仅一传之内的人物构成对比、映照，而且在篇目安排上也有对照。如《李将军列传》即是同写卫青、霍去病的《卫将军骠骑列传》对照着写的。黄震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传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蹶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氏日钞》）说得极是。其他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魏公子列传》和《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等等也都如此。两两对照，相形益彰；作者的爱憎臧否，也不言自明。

夸张手法。也是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中常用的。《滑稽列传》写淳于髡仰天大笑，竟至“冠缨索绝”。这还只是细节上、语言上的夸张。《史记》还多记夸诞之事。如《项羽本纪》写项羽被围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

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种夸张描写则是酣畅淋漓地表现英雄形象的大胆的艺术想象了。后来《三国演义》写张飞勇猛无比，长板坡三声大喝，使“夏侯杰惊得肝胆破裂，倒撞于马下”，大概就是从《史记》这类描写中继承而来的。

《史记》的人物描写手段繁富而高超，尤其让人叫绝的是，经过司马迁独具匠心的构思，历史事件的叙述摇曳多姿，构成悬念迭起、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情节，结合多种多样的描写手段，充分表现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一节，从曹无伤告密、项羽下令“击破沛公军”开始，紧接着项伯夜驰、张良献计、沛公谢罪、项庄舞剑、樊哙闯帐、沛公逃席、范增生怒等一连串事件，最后以“沛公至军，立诛曹无伤”结束。结构严密，故事性极强，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惊心动魄，引人入胜。其中对人物的行动、语言、心理、细节以及宴会的场面都作了历历如绘的描写，也不无夸饰之处，而且两个集团的主帅项羽和刘邦、谋士范增和张良、内奸项伯和曹无伤、勇将项庄和樊哙，一一对照，相映生辉，这样就把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写得如同一篇精彩的小说，而各人的思想性格也都得到浮雕式的展现。

与此相联系的，《史记》还善于从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变化发展中刻画人物。这是促使《史记》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复杂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外戚、贵族窦婴、灌夫和田蚡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矛盾利害关系，作者精心写出它的产生和发展，由小而大、由浅入深的变

化，有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紧，最后终于在雪球的爆破中，自然生动地完成三个不同个性的独特面貌，使之在矛盾关系的变化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刻画。

总之，《史记》大大丰富和提高了我国人物描写艺术，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座令人景仰的丰碑。

文学是语言艺术。《史记》的艺术成就还突出地体现在它的语言运用上。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语言大师之一，是历代学习的典范。正是由于出色的语言艺术，他的超乎常人的先进的思想和绝妙的描写才能借助语言这一物质载体得到完满的体现，而使他的《史记》成为不朽的名著。

《史记》的语言，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高度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用的都是经过他提炼的当时的规范的口语，简洁、平易、流畅、形象。司马迁即使引用年代已久远的古书，也要把它译成当代文字，所以读起来没有“佶屈聱牙”之感。《史记》甚至还直接吸收民间的谚语、俗语、歌谣到作品中来，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等等。由于《史记》注意学习、吸取民间语言，而使自身的语言极有生命力，不少语汇如“后来居上”“毛遂自荐”“利令智昏”“背水一战”“兔死狗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等等流传至今。

《史记》的语言，具有与西汉鼎盛时期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雄浑、古朴、气势盛壮的风格。这不仅跟六朝文学的纤细靡丽不同，而且和唐宋之后以司马迁为楷模的古文家们刻意求工的文章也不一样。凌约言说：“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横不可羁，而自中于律。”（《史记评林》引）《史